

战略文化底蕴与传承

林东旭

(福州大学军事教研室, 福建福州 350002)

摘要:战略文化底蕴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思想文化传统。战略文化研究起源于美国,后在世界范围被广泛接受。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战略文化底蕴深厚,其核心思想是:反对暴力、谋求统一、重视防御。

关键词:战略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传承

中图分类号:EO-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321(2005)02-0096-04

“战略”一词原是一个纯军事的概念,主要是指“对军事斗争(战争)全局的筹划和指导。”^[1]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略”作为一个学术语言开始越出军事范围,被陆续用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等广泛领域。现在已经用来“泛指重大的带全局性或决定全局的谋划”(《辞海》)。战略理论的广泛应用,从不同角度探索战略问题,极大地丰富了战略理论本身。“战略文化”理论的研究就是从历史文化角度研究战略问题,并且极大地丰富战略理论的一个生动例子。

一、战略文化的主要内涵

“战略文化”一词作为学术概念形成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至今不过二十余年的历史。其主要内涵是,战略深受本国、本民族历史思想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战略文化把对战略的研究置于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之中,避免了一些急功近利和主观臆断倾向,使得战略有了厚重的根基和稳定的脉络。战略文化受到一个国家和民族大文化的影响,同时又是大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战略文化的发展可以丰富大文化的内容甚至促进大文化的变革和创新。正如李际均在《论战略》一书中提到:“世界上每一种文化传统都包涵着关于战争的思想,每一种战略思想又

都与一定的思想文化相联系;战略的底蕴和根基是思想文化,而且战略思想最终要汇入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的发展历史中去;思想文化与战略相结合,我们可以称之为战略文化。”“战略文化是在一定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所形成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并以这种思想和理论指导战略行动和影响社会文化与思潮”。^[2]

对战略文化的研究最早起源于美国,而后在世界范围被广泛接受。战略文化概念的出现有它的历史背景。此前,传统的战略学一般认为战略决策是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决策者以客观环境为依据,以理性、务实的态度做出判断,进而制定适当的战略。因而在战略学教科书中,有关战争环境及其分析技术占据着相当的篇幅。但是随着国际政治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冷战”的结束,国际战略格局和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过去那种以“两极格局”和“意识形态”对抗为背景进行的环境分析、研究的基础已不存在,部分学者遂转以“文化特殊论”为依据,认为战略决策的产生不只是一个以客观环境为皈依的理性取向,而是决策者受文化传统、历史因素局限之下的行为体现。从事“战略文化”研究的学者们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战略文化”可以对不同国家、军队的战争行为

收稿日期:2004-10-08

作者简介:林东旭(1963-),男,福建连江人,福州大学军事教研室讲师,硕士。

提出更全面的分析。战略文化研究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引起广泛的关注,其核心价值在于它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将战略学和文化哲学放到一起来研究,尝试从历史思想文化的角度看待战略现象,从历史思想文化的发展中厘清战略现象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联系。例如,人们在战后从威廉二世《德皇雄图秘著》中体现的“征服全欧,统一世界”的战略构想和黄祸论、人种优越论等荒谬理论中,找到阿道夫·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文化渊源;从日本的神道教、武士道精神,以及16世纪后半期丰田秀吉统治日本时期的大陆政策中,找到日本屡次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文化渊源。

西方国家的战略文化研究大致经历了“决定论”(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工具论”(8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干预变量”(90年代以来)三个阶段的演变^[3]。所谓“决定论”即认为不同国家的战略文化主要是由历史经历、政治文化、地理位置等变量的独特性引起的,是相对固定的决定因素。这一时期,西方战略文化研究的重点是解释美苏两国核战略不同的原因,认为美苏战略文化的不同是美苏两国不同战略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主要代表人物有杰克·史奈特、格雷、洛德和琼斯等人。所谓“工具论”即认为战略文化无非是战略决策领域政治精英们手中拥有的用以模糊或掩饰他们战略选择的工具,其目的是给他们所实施的战略赋予文化或法律上可以接受的合法性,并以此消除或误导可能出现的政治挑战。主要代表人物有布莱利·克莱因、罗宾·洛克汉姆等人。所谓“干预变量”即认为战略文化既不是决定因素,也不是工具,而是一种“干预变量”(有的学者使用了军事文化、政治军事文化或组织文化的概念)。在这一时期,战略文化研究侧重于“利益决定论”所无法解释的战略选择问题,并把战略文化的研究由纵向引向横向,由历史引向现实和经验。主要代表人物有列格罗、科尔等人。

文化对战略的影响是战略文化研究的核心内容。认识它国的战略文化,知己知彼,是战略分析中的必要条件。“战略文化”加深了我们对历史研究的关注,有助于研究对方的战略动机、自我形象以及行为模式并最终会加深对不同国家、文化的了解与沟通等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后冷战的新世界格局影响之下,有关的学术领域也呈现重新整合的现象,现实主义的思想框架备受挑战,

学者们另辟路径,纷纷借鉴文化理论从历史上寻找更多素材,从战略文化角度对一些不同文明和价值体系的冲突重新加以审视,以突显战略决策中的历史和文化特质。因此,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例如兵家思想、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对战争、和平的看法等等都纷纷成为战略文化的研究对象。

二、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底蕴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中国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不仅孕育出灿烂辉煌的人文思想,而且产生了具有深刻哲理的战略思想。

中国的战略文化起源很早,在先秦就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陈公十三年》)的提法。当时的华夏文明,培育了《孙子兵法》、《吴起兵法》、《孙臆兵法》、《六韬》等军事战略思想和理论,同时在《周易》、《老子》、《尚书》、《论语》、《孟子》中也包含有若干战略的观念。这些都成为先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基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整体和谐,其内容极为丰富,概括起来主要有“仁战”、“义战”、“慎战”、“教战”、“守战”、“谋战”等思想。

“仁战”。“仁”是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认为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中,不应存在包括战争在内的任何暴力现象。《论语·子路》云:“善人为邦百年,亦可胜残去杀矣”《论语·颜渊》载:“季康之问政于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论语·宪问》载:“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子拒绝战争暴力进入“仁”的道德理想社会,根源于“仁者爱人”道德原则,他虽然对周礼充满敬仰之意,但对以武力推翻商纣的周武王表示不满,《论语·八佾》说:“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义战”。中国的战略文化传统讲究战争的正义性,其核心是保国安民。《吴子·图国》说:“禁暴救乱曰义”;《孙臆兵法》说:“义者,兵之首也”;《司马法·仁本》说:“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战之可也”,主张“攻无道而伐不义”。而秦统一以后,“义战”的内涵自然延伸为谋求国家的统一。

“慎战”。主张理性用兵。孙子认为:“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因此对待战争必须“慎之”,“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而

应当以“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为用兵原则。

“教战”。孔子十分强调军事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论语·子路》载:“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在孔子看来,贤人教育人民多年才能作战,倘不教育人们,训练人民,一旦国家遇有战事,仓促把人们送往前线,那只能是白白送死。

“守战”。注重防御作战胜于进攻作战。《尚书·泰誓》中有“罔或无畏,守执非敌”,《孙子·军形》说“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而道家的“后发制人”和墨家的“非攻”思想则最为著名。

“谋战”。追求在战争中以智谋和方略取胜,以战略取胜。《管子》强调:“争强之国,必先争谋、争形、争权”。《孙子兵法》极讲究“庙算胜”,是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不斗,大兵无创”的全胜理论,成为中华民族最高境界的战争艺术等等。

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核心思想是:反对暴力、谋求统一、重视防御。

反对暴力、崇尚和平是中华民族的天性。表现在文字创造上的“止戈为武”;道德观念上的“和为贵”、“仇必和而解”;政治上的“兼爱”、“非攻”、“以战止战”;军事上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不斗、大兵无创”等。与西方国家早期有关战略思想的论述主要来自史学不同,中国早期有关战略思想的论述主要来源于兵学。即使是这些专门论述军事谋略的典籍,受道家 and 儒家道德思想文化传统的影响,兵学专家们也历来强调以非暴力的手段战胜敌人,运用谋略不战而屈人之兵,推崇“不以兵争天下”,“以威德服人,智谋屈敌”的理想,崇尚“自古知兵非好战”的武德。甚至认为“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止”,“战胜以丧礼处之”(《老子》第31章)等。而战争一般是以自卫为主惩罚入侵的敌寇,使其知难而退。中国兵学从来不鼓励战争,也不以军事行动为光荣。这种以文化特征为依皈的智慧是不能以西方理性战略的角度去解释的,它体现出中国人所特有的理智和含蓄的民族性格。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根本找不到像日本《明治遗训》、德国《德皇雄图秘著》、俄国《彼得一世遗嘱》那种侵略扩张的传统理论。正如西方学者所评论的:中国对自己文明的认识没有那种侵略性的使命。最能证明这个问题的是,中国明代的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

比西方的哥伦布、达·伽马等的航行要早半个世纪以上,舰队规模也是他们的几倍,但中国郑和带去的是瓷器和丝绸等,而没有利用当时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去建立殖民地。这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

中华民族是一个珍视统一的民族,统一观念是中国战略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反对分裂,谋求统一,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与大融合,这是中国几千年战争史的主流。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古代有文字记载的战争,从夏代到清代结束,4000多年间共发生了5000至6000次战争,占世界同期发生战争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中国古代战争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统一战争史,除了晚清的几场抗击外国入侵的战争外,基本上是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和政治集团为谋求统一而进行的战争。无论一个时期内国家如何分裂、各民族间如何对立,最终的结果仍是在民族和解中产生着新的更大范围统一的中国。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繁衍和生息的人民,无论它们生活在哪个时代,无论它们属于哪个民族,也无论他们信仰什么宗教,甚至无论他们迁徙到什么地方,都始终保持着对一种统一文化和一个统一国家的高度认同。中华文化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文化体系,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习俗都可以在这个博大的文化体系内融汇与发展。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发生过西方历史上那种惨烈的宗教战争,就是很好的例证。

中国的战略防御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易》中的“师左次,无咎”,《尚书》中的“罔或无威,守执非敌”,后来发展到《孙子兵法》中的“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中国战略文化的防御性质是得到世界公认的。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说:中国的决策人历来强调防御性的地面战争……与欧洲帝国主义行动中所显示的商业扩张主义的进攻理论截然不同。托马斯·克利瑞说中国将武力的使用限于防御目的,是受源于道家 and 儒家道德思想的影响。战争只是不得已的手段,而且必须有正当的理由,这通常是指防御战争,但不排除惩罚性战争,以制止以强凌弱的行为。中国的万里长城从来都是防御的象征,而不是国界的象征。儒家主张:“夷狄之入中国者则中国之”。历代中原政权所实施的军事战略,如偃之以兵威,和之以婚姻,阻之以城塞,施之以禄位,通之以货利,怀之

以教化等等都反映了中国独特的战略文化。美国作家蒙特罗说:“征服中国,好像把一只剑投入海中。其抵抗似乎很小,可是不久以后,钢铁就会生锈,而且被合并了。这合并的过程非常彻底,几代之后就只有哲学家才知道,谁是征服者,谁是被征服者的了。”这个比喻极富有文化和哲理含义。

三、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传承

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人民开始了伟大的革命战争,对历史留下的战略文化传统进行了科学的扬弃,传统战略文化的精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赋予新的意义。中国现代战略文化划时代的里程碑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创立。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战略文化,总结了**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战略理论。这一理论一直延续到今天。他强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要别国的一寸土地;也不许别国侵占我国的一寸土地。抗战胜利后,我国放弃了战争赔款;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对战俘实行真正的人道主义政策;对印和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国在有能力继续追击的情况下,又主动回撤到实际控制线,并释放全部战俘,这种宽仁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体现了中国战略文化的特色。新中国成立后的八次对外战略性军事行动,都是反侵略和自卫性的。^①中国的军事战略边疆根本不会超越他的自然边疆。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倡导和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军事与政治外交相结合的斗争中,始终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和平问题涉及主要是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政治信仰的国家和民族要通过对话而不是诉诸武力来解决分歧。发展问题强调处在不同发展水平和阶段的国家通过互利合作,缩小贫富差别,促进全人类的共同繁荣与进步。但是,当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领土争端、民族矛盾、宗教纷争、

恐怖主义等因素引发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连绵不断。在对待我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争端中,邓小平同志提出通过和谈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战略思想,为解决国际领土争端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在对待国际关系上,中国政府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承诺永不称霸,一贯主张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和平相处,和为贵;在处理地区热点、难点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运用和平的方式和手段在联合国框架内加以解决。中国的这一观点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和支持。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日益强大必将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一切有关“中国威胁论”的论调都是毫无历史根据的猜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成功地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已成为国际政治舞台的重要一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在台湾统一问题上同国际反华势力和台湾岛内的顽固台独分子进行了艰苦而又卓有成效的斗争。中共三代领导人以其非凡的智慧和宽大的胸襟提出了符合两岸实际、切实可行的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八项主张”为核心的对台方针、政策,而且重申在台湾的“一国两制”将比港澳地区更加宽松;提出通过政治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在一个中国的原则基础上什么问题都可以谈;提出分阶段实现统一,第一步是通过两岸进行政治谈判达成结束敌对状态协议,在此基础上,共同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进行规划。所有这些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政策基础。在中国分合治乱的历史循环中,统一始终是历史的主流。结束分离的不幸,实现祖国的统一,已成为摆在两岸人民面前的神圣职责与使命。

注释:

- ① 指1950年至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1950至1954年的援越抗法作战;1965年至1973年的援越抗美作战;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1969年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1974年的西沙自卫反击战;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1988年收复南沙岛礁作战行动。

参考文献:

- [1] 王文龙. 战略学[M]. 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
[2] 李际均. 论战略[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
[3] 方长平. 西方战略文化研究:从文化主义到建构主义[J]. 国际论坛,2004,(3).

[责任编辑:苗健青]